

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述论*

Analysis on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Unearthe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黄 洋

Huang Yang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 中国考古学家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 也通过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方式传播考古成果。民国时期共举办了20余次各种考古出土文物展览, 这些临时展览虽然大多展期都很短, 但却引起强烈反响。考古出土文物展览影响了公众的古史观念与民族认同。在展示手段上, 运用了图表、通俗易懂的说明文字、模型等, 还采用古今对比展示、专家现场导览、考古遗迹展示等方式, 通俗化地传播考古成果。观众有业界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普通公众等各阶层, 反响热烈。民国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展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考古学的价值, 并促进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也为后续公众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好了铺垫。

关键词: 考古博物馆 出土文物展览 公众考古 考古成果转化

Abstract: Chinese archaeologists broadcasted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while conducting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y held more than 20 exhibitions of various archaeological relics. Although most of these temporary exhibitions were of short duration, they aroused strong responses. The exhibitions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have influenced the public's concept of ancient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erms of display means, they used charts, understandable captions and models, as well as comparative ancient and modern display, accompanying on-site tour and archaeological relic display to spread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a popular way. The audience included industry experts, schola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exhibitions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unearthe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mpted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value of archaeology, enhanc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ivated the subsequent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chaeology.

Key Words: Archaeological museum; exhibition of unearthed relics; public archaeology; transformation of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化解码与传播研究”(21CKG025)阶段性成果之一。

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对数十处遗址开展了考古工作，初步了解了各地史前文化的面貌，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的年代序列，培养了一批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的发展做了准备。”^[1]除科学发掘与研究工作外，考古学家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与传播考古成果，其中举办考古出土文物展览是重要途径之一。本文爬梳民国时期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要展品的临时展览，以期还原民国时期中国考古成果的转化与传播方式，并启发今天出土文物与考古成果的展示。

一、民国时期考古成果面向大众转化

民国时期，考古成果面向大众转化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学术出版，二是面向公众的展览。当然，除此外，还有讲座、科普文章等。

学术出版，包括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及学术论文发表。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次年就出版了《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32—1933年，河南古迹研究会先后四次发掘浚县辛村西周时期卫国贵族墓地。1932年4月16日至5月18日，发掘工作结束后，河南古迹研究会就整理资料，分类研究，编制详细报告^[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部田野发掘报告集。民国时期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都非常及时，有助于学界第一时间掌握考古资料。同时，考古学家发表了众多学术研究论文，试图描绘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对公众的古史观念与民族认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社会层面影响更为广泛的，便是考古出土文物展览，包括举办专门的考古出土文物展览会、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历史博物馆或择其他公共场所展示。举办最为成功、影响也较为广泛的就是“古物展览会”“出土文物展览会”“考古成绩展览会”

等专门举办的考古出土文物展览。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陆续举办了20余次各种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表1），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1931年在南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考古成绩展览会。有的展览非常具有时效性，如1940年重庆江北第四汉墓发掘结束后，“旋即在汉墓旁开展览”^[3]。

除专门展览会外，考古机构也将出土文物送至博物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公开展出。如1924年河南信阳游河镇掘得古物多件，新制玻璃柜十余架，珍藏于历史博物馆^[4]。1925年10月30日和31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将陈万里前往甘肃敦煌考古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陈列展览^[5-6]。金陵兵工厂发掘出古铜塔墓志等数十件，交南京古物陈列所陈列^[7]。1931年春，山西图书馆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组成考古团在万泉县发掘石器时代遗址，6月在图书馆三立阁开展览大会^[8]。太原同蒲路掘得古物转交山西省立博物馆陈列^[9]。安徽省凤台县出土古物在县府陈列任人参观^[10]。奉天市砂山公园所发掘之辽汉古坟出土的物品在“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展出，供公众观赏^[11]。西湖博物馆自1935年以来，对于考古方面，极为注意，先后经馆员之努力，采集石器、黑陶器、麻布纹陶器、陶片等甚多。1936年底，西湖博物馆举办出土古物展时，展示了何天行调查和采集的所有良渚黑陶以及晋瓷，并于1937年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2]。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在陕西西安附近曾发掘大批古物，运至该院保存，“惟该项古物，均为外间所罕见者，且均有历史上研究之重大价值，亟应公开陈列，供众浏览，不应存储室内。教育部有鉴于此，将该项古物拨交古物陈列所陈列”^[13]。

有的博物馆专门设置考古出土文物专题展厅。如1930—1937年，河南博物馆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等基础上，先后开放13个展厅，包括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等^[14]。先前洛阳地区出土的铜器、陶器、瓷器等，或由时任督军馈赠河南博物馆，或由政府划拨等，皆陈列在洛阳古物陈列室^[15]。

表1 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一览表^①

时间	展览名称	展览地点
1922.12.16—12.19	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	北京大学校园第三院
1924.8.1起数日	河南信阳游河镇出土古物展览会	北京历史博物馆
1929.12.5起	安阳掘得甲骨展览会	河南民族博物院
1930.12.18起	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之古物展览会	北京大学校园
1931.1.1	谭城古物展览会	青岛大学工学院
1931.1.1起	龙山古物展览会	济南山东高级中学第三院
1931.1	城子崖发掘古物展览	济南正觉寺
1931.2.21—2.24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考古成绩展览会	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1.3.26—3.28	山西古物展览会	山西公立图书馆三立阁
1932.9.15—9.17	河南古迹研究会出土古物展览会	河南博物馆
1934.2.20起	寿县出土古物展览会	安徽省立图书馆
1934.7.9—7.11	陕西考古会发掘斗鸡台古物展览会	西安
1934.8.9起	斗鸡台古物展	北海团城
1935.4.28起	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绩展览会	河南古迹研究会展览会会址
1936.1.1—1.6	安徽省立图书馆文物展览	安徽省立图书馆
1936.2.15—2.16	奄城金山古物展览会	上海民众教育馆
1936.8.30起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出土古物展览会	上海青年会
1937.1.1—1.3	浙江古代出土物品展览会	杭州忠烈祠后新建西式楼屋
1937.6.18—日	吴越史地研究会嘉兴分会成立展览	嘉兴中山厅
1938.8.4—日	陕西斗鸡台出土古物	国立历史博物馆
1939.8.13—8.14	博望侯墓道古物校内展览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室
1940.3.16—3.18	西康文物展览	重庆青年会
1940.4.21—日	重庆江北汉墓古物展览	重庆半山竹庐
1941.2.9—2.16	古物展览会	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
1943.10.10—日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题展览会	宜宾李庄
1943.11.12—11.25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题展览会	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经验

上述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运用通俗化、多样化的展示方式，并且影响较大，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1. 影响公众古史观念与民族认同

第一，考古出土文物展览举办的最重要原因是披露考古成果，以物证史。民国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很多记载不可靠。而考古学靠实物说话，重建中国上古史，有助于

^① 此表据笔者所见民国文献整理，只列举了专门的考古出土文物展，其他展览中涉及的考古出土文物展示未列入表中。

社会走出“疑古时代”。“新出土之古物，能显出古代文明进化之痕迹，实有公开之价值，俾社会共同传观。”^[4]如因新从安阳掘得甲骨甚多，1929年特举行展览会，以引起社会人士研究之兴趣^[16]。卫聚贤等1930年在晋南万泉县汉汾阴后土祠等处，挖掘古物，所获颇多。为供社会人士参观便利，将各物整理完善，编制名目^[17]，为供各界参观研考，在文庙图书馆特开古物展览会三天，以供各界人士批评^[18]。陕西省为周秦汉唐建都所在地，古物古器所在皆有。惟民众对于古物，不能认识，致遗弃淹没，不知几多。陕西考古会有鉴于此，故拟将该会所掘得之古物等件，分类陈列，供观众参观，增进他们对于古物之常识，也可以将古物尽量呈现给公众^[19]。金山卫戚家墩及常州奄城遗址发现古代陶片极多，由此可证古代南方亦有悠久历史文化，且从此类遗物中，足以观见吴越民族之文化，更能了解我国南北文化之不同^[20]。广东文物展览会中涉及古迹也是因为“比年地下之发掘，实物之参稽，已证明此邦文化之进程，具有深长特殊之历史”^[21]。这些展览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古史观念。

第二，通过考古出土文物展览，实现文物的时代价值，为民族认同做出积极贡献。古物的陈列，其用意是要使人通过参观，对国家发生更大的爱慕，而一致奋起振作，为复兴民族而努力^[22]。河南古迹研究会“将三年来工作成绩公诸社会，并借以促进社会对古物之重视，冀由参观古物之感发，以达于民族之复兴”^[23]。民族是一个有机体，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物是文化的细胞，由于文物新陈代谢，文化不断发育滋长；石器时代有石器时代的文物，青铜时代有青铜时代的文物，以至铁器电器各时代，各有其各时代的文物；文物的嬗变，正是文化演进的里程碑。举行文物展览，正应接受先民丰富的遗产，加倍奋发惕厉，要继续往开来，创造新的文物，迎头赶上时代的要求，眼前这许多丰富的文物，正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资本，加上今后的努力，去建设文化国防^[24]。“旧有之文物，用特陈于观众之前，庶几鉴古知今，抚今追昔，俾兴感之余，而知所自励。”^[25]

文物展对于国人认识我们的国家、家乡及增强身份认同也意义重大。1939年，民国政府设置西康

省。1940年3月，西康文物展览会举办，其中涉及珍贵文物^[26]。“随着时代的进展，西康已取得他的重要地位，可是在西康建省以后多数国人的观感，恐怕还是和二三十年前甚至二百年前国人所具的观感相差不远，因此唤起大家注意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知道他在国防上、经济上的重要性，是一件不容缓待的事。当然我们所应注意的，不仅是西康，假如以后还能见到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文物展览会，自然是同样愉快的。这次展览会的意义是如此，我们的希望亦复如此。”^[27]

第三，有些展览是为配合特殊纪念活动而举办，并提升活动文化品位。据报道，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28]和三十一周年^[29-30]校庆纪念会时，都曾举办古物展览会。特别是三十一周年校庆时，展出古物多达约九万余件，有明器、甲骨、甘肃出土之各种古物、燕都故城遗址出土古物等。1937年吴越史地研究会嘉兴分会成立当日，卫聚贤、陈志良携山西、杭州古荡、杭县良渚出土的文物举办公开展览^[31-32]。1943年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为学校五十五周年纪念，在长沙举办展览，展出包括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漆器等^[33]。

民国时期，李济、梁思永、曾昭燏等先生留学国外，对考古学和博物馆学都有研究，而博物馆学更加注重的是面向大众。这些思想都对当时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举办产生影响。另外，民国报纸杂志对于国外考古出土文物展的相关报道或许也给我国考古成果面向大众展示有所启迪。如1924年，《时报图画周刊》就报道了埃及都丹克门王墓新发掘出土古物的展览，并配发了展览现场图片^[34]。1925年，《民国日报》报道，苏联科学院于该院成立二百年纪念之际，举行考古学展览大会，展览五年来该院考古方面之成绩^[35]。1935年，韩儒林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中载“1890年正月，莫斯科开俄国第八次考古学会，乘机举行古物展览会”^[36]。

同时，在对外文化方面，学界也希望通过出国展览，让国外民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古物与文化。如卫聚贤撰写过一个理想的中国古物出国展览计划，其中就包括将出土的明器、彝器等列入出国展览目录^[37]。

2. 运用通俗化、多样化的展示方式

考古出土文物对普通公众而言专业又陌生，如果展示方式不恰当，不但公众理解不了，也会产生不好的感觉。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滕固曾说：“吾国南北虽有若干博物馆陈列所，然就鄙人印象而言，往往类一杂货摊，不能予人以明晰舒畅之感。”^[38]这确实是民国时期很多博物馆展览的通病。

而这些考古出土文物展览通过图表、模型、场景等辅助方式对于考古出土文物进行通俗化处理。首先，对于说明文字，用通俗易懂、文学化的语言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如奄城金山出土文物展览会的报道如下。

会场的布置，是循着凹字形环绕着无数长方柜子。上面是铺着白的柜布，在白的柜布上面，就是一块块的古物陶片了！朱红漆的廊柱上，写着许多关于这次展览的阐明语句。除了联贯着的凹字形长方柜子以外，大成殿的中间还单独地摆着一张柜子，正中贴着许多标语：

江南的历史，最早是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但各书上对于吴越记载得太简略了！这一批古物，是在春秋以前吴越人的。由这些古物，可以补充吴越历史的不足。由这些古物，可以知道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同。

这是江南前期文化结晶。

我们应该怎样去努力恢复吴越民族固有文化。

断碎的陶片，给我们没有考据经验的人看来，是跟乡间满地的碎瓦片没有两样。可是他们是分析得这样清楚，譬如在每一块上面标明着，这是口部，嘴，盖，耳，鬲，鬲腿，鬲身，鬲口，鼎腿，豆腿。关于花纹，也有细纹，精细花纹的分别，以及松质、硬质等都有纸卡的标示。也正是因为如此，记者写道，“虽然对于考古学是一个门外汉，可是也十足地在那里观察了一个多小时”。当他们离开那里时，入口处的门前，正有无数的参观者群挤着进去。^[39-40]

展示时，还采用古今对比、绘画情景再现等方

式让观众更容易理解文物。1934年，胡适将周口店人的头盖骨带至上海市博物馆展出。“展览时，除此头壳外，更拟附带陈列近人之头壳。他如人猿、猴类等头壳，亦将同时陈列，以资参观者之比较”，另外，还有一幅“北京人”的绘画，其与若干同伴“正在洞口窥望平原地上所畜之兽类。此种兽类，即为彼等之食物。相隔不远处，更有一海。在此山洞之侧面，此人正与一利齿之虎相争。虎则面目狰狞，与人相距甚近，一若欲扑杀此人。此人乃手持石片，向虎猛击。有一妇人，不胜恐惧，匿于洞口。此图虽非写实，然图中所绘景象我人可推知人兽杂居时代，必时常发生也”^[41]。将北京人头盖骨与今人的头盖骨放在一起对比，让观众从自己的角度类比认知，以及通过绘画形象复原古人生活场景的方式，可以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在有的展览中，考古学家亲自参与展览的讲解服务等。如1931年的山西古物展览会时，除了墙上贴有各种说明表与照片，卫聚贤也亲自在场指导^[17, 42]。1943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举办“一日展”，后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展出14日，除各种图表、照片、中英文简要说明外，李济先生还撰《远古石器浅说》，稿件封面上标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字样，放在展览现场作为参观指导^[43-44]。

除了展示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还将考古遗迹等作为展品。1931年谭城古物展览会除展示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等，还有谭城想象图，“又有谭城土数块，版筑痕迹宛然，又有灶土，系以碎麦秆和土而成，一同今人方法，麦秆痕迹尚可辨认”^[45]。

3. 吸引了各阶层的众多观众

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观众既有业界专家学者，也有政府官员，当然最多的还是普通观众。1924年，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河南信阳游河镇出土古物展览会，“各界参观来宾，有金石家王国维、傅增湘、邵章、孙壮、金拱北等，北大古物研究所沈兼士、马衡、顾颉刚、陈垣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十余人，两院议员叶夏声、雷殷等二百余

人，教育部罗次长以次百余人，此外又有舒尔曼福开森等五十余人，以及各界来宾，共计八千余人，亦可谓盛矣”^[4]。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委员会于8月对张骞墓进行了发掘，经整理后，当月在校内考古室举办展览，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及校内师生数百人参观^[46]。

政府官员出于政治目的或个人兴趣，也纷纷前往参观。中央研究院考古成绩展览会专门招待政府官员及报界。《邵元冲日记》记载，1931年2月23日，“赴中央研究院展览会，所展览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物品，计有龟甲、字骨、卜骨、骨镞、骨针、骨笄、兽头、刻辞、货贝、蚌镞、石戚、铜矛、铜刀、陶范（为细砂作成，花纹有极精者，可见殷代铸铜业之盛）、带彩陶刀、带釉陶片等，盖皆为殷墟之一部分，足以考见当时文物之盛者也。次日下午，他又偕默君及非百再至中央研究院展览会一观”^[47]。1934年2月19日，时任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参观寿县古物展览，并索该馆工人所印出古字多种，要带回仔细研究^[48]。

从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观众数量较多，反响很好。1931年，中央研究院举办考古成绩展览会时，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展览会还特意延迟了一日闭展^[49-50]。但也有例外，如河南古迹研究会成绩展览会报道，“龙亭在此春光明媚之际，本为士女游履荟集之所，惟参观展览会者，则寥若晨星。记者今日至会参观时，见同时参观最多不过一二十人，谅系残铜碎瓦不能引起一般人兴趣之故云”^[23]。报道说是文物不够精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观众虽然来龙亭，但主要目的是游玩，而非来展览会参观学习。

三、民国时期考古出土文物展览的思考

民国时期的这些考古出土文物展览，无论是举办缘

由、展示方式等，都对我们重新思考考古学是什么、考古学的价值及考古成果如何面向公众传播有所启示。

第一，考古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知古鉴今。“从死的物件上，看出某代社会的背景，再用历史家的眼光来解释给今人听，这样才算做‘考古’”^[51]，而研究考古学的基本意义及其用途是“促进文化，改良社会”^[52]。考古学虽然是研究古代人类生产生活，但通过对古代的了解以对今日的人们与社会产生影响，搭建古代与现代沟通的桥梁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考古学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考古成果的转化也促使民众更广泛地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卫聚贤曾撰文，“学问分为普通及专门两种，考古一类都目为专门学问，以为有几个人知道就够了。我的意思考古一门要普通化，使人人对于考古有了常识与兴趣，对于发现古物及保护古物上有很大的帮助”^[53]。胡肇椿也提出通过考古学展览会加强宣传，“每一件古物之下有详细的说明，说明那古物对于古代文化上的贡献。引起国民对于考古方面的兴味”^[54]，从而减少盗掘的发生。郑师许也谈到，“使考古学之常识灌输于大多数人之心中”，鉴于此，其中一方法便是出版考古学丛书，其中“古器物之整理与陈列”必不可少^[55]。而事实证明，考古文物出土展览的举办对公众确实产生了影响。奄城金山古物展览现场，一张小方柜上，陈列着三件完整的陶器：右边摆着的是罐，是在松江发现的；左边摆着的是尊，是在金山发现的；正中摆着一件比较大的，是在展览期间由一个彭忍安先生看了他们的展览会后送来陈列的^[39-40]。甚至陕西考古会因为社会多数人对于古物之认识尚少，决定筹办民众学校，除教授普通课本外，特别注重灌输古物研究之常识，利于推进考古工作^[56]。

第三，考古成果的转化与普及传播应该方式多样。上述考古出土文物展览，民国时期的学者往往称为“特种展览会”^①，一是指时间短，不超过七

① 陈端志专门论述了“特种展览会”这一问题（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第209—211页）。也有报刊报道上海市博物馆举办两次特种展览会（《沪市博物馆举办首次特种展览会》，《立报》1937年2月6日，第5版；《上海市博物馆今日特种展览会》，《民报》1937年4月4日，第7版；兰心：《市博物馆举行第二届特种展览会》，《上海报》1937年4月12日，第6版）。

日，二是为此一个专题的或专门意图举办的展览。关于考古的普及，卫聚贤提到两种方式：一是将古物做成标本，实物标本分装数盒，照片拓片分订书册，并编写统一简单说明书，凡是高中及大学历史系必备一套；二是现在修路筑厂，翻土的工作甚多，地下被露出的古物更多，而监工及工人并无考古常识，大半都毁坏了，一小部分流入古董商人之手，转入国外，在文化上损失不少。故应将各类古物每类择二三件照成相片，如有必须表现色彩的则上色，分类加以简单的说明，其说明务使明白古物保存的意义，使不致目古物为无价之宝而盗卖。将这各种古物样本，印上若干万册，分送于土木工程的人，作为参考。遇见古物，立即就近报告古物保管机关及学校，小而可将古物搜集，大而可从事发掘^[53]。民国时期，还有考古学家尝试拍摄考古影片以宣传传播^[57-58]。李济提出设立国家博物院或在考古发掘地建立博物馆，收藏并展出田野考古出土文物，对民众进行教育的博物馆理念^[59]。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展览并非昙花一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今天，考古出土文物展览都是考古成果转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对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外交手段。近些年，很多博物馆都举办考古出土文物展览、考古成果展览、某某考古学文化展览等，特别是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比结束后，都会及时通过展览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信息。1973年出国巡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在国外掀起中国文物热潮，不仅让欧美民众更深入认识古老中华文明，也让他们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同时，民国时期的考古出土文物展览是考古成果面向公众转化思想的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遗址博物馆建设、“考古大众化”思想、公众考古学理念等都是对其的延续与发展。

附记：本文得到了徐玲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略表谢意！

参考文献

- [1] 王巍.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N]. 光明日报, 2021-11-17(13).
- [2] 河南古迹会展览出土古物[J]. 时事月报, 1932, 7(5): 174.
- [3] 渝发掘汉墓工作暂告结束 第四墓工作完竣 各古物公开展览[N]. 神州日报, 1940-04-21(1).
- [4] 天豪. 京历史博物馆展览会纪[N]. 申报, 1924-08-06(11).
- [5] 考古照片展览[J].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1925(1): 120.
- [6] 荣新江. 敦煌学新论[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106.
- [7] 金陵兵工厂掘得铜塔墓志 在江市古物陈列所陈列[N]. 中央日报, 1930-11-25(7).
- [8] 山西图书馆展览古物[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1, 7(3): 52.
- [9] 晋图书馆陈列古物 同蒲路掘得[N]. 盛京时报, 1933-08-14(1).
- [10] 凤台掘获古物已送县府陈列[N]. 大公报(上海), 1937-02-01(10).
- [11] 考古界之新发现 奉市辽汉古坟出土贵品决陈列于国立博物馆内[N]. 盛京时报, 1942-11-13(5).
- [12] 何天行. 良渚镇的石器与黑陶: 良渚文化的早期著录[G]//何天行. 何天行文集. 周膺, 何宝康, 编校.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0-24.
- [13] 前在陕发掘之大批古物公展[N]. 盛京时报, 1938-04-02(7).
- [14] 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馆80年 1927-2007[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7: 18.
- [15] 曾广庆, 赵振华. 民国时期河南博物馆藏洛阳出土文物[G]//洛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221-225.
- [16] 河南安阳发现古物[N]. 时事新报(上海), 1929-12-05(8).

- [17] 晋省古物展览会[N]. 申报, 1931-04-02(7).
- [18] 晋古物展览[N]. 益世报(天津版), 1931-03-31(7).
- [19] 陕考古会发掘斗鸡台 古物分类陈列[N]. 盛京时报, 1934-06-29(6).
- [20] 金山奄城古物展览在民教馆举行[N]. 新闻报, 1936-02-15(18).
- [21] 广东文物展览会之举行[J]. 图书季刊, 1940, 新2(1): 141.
- [22] 金戈. 说在古物展览以前[N]. 中央日报, 1936-05-27(9).
- [23] 豫古迹研究会举行成绩展览会[N]. 中央日报, 1935-05-02(6).
- [24] 王捷三. 文物展览的意义[J]. 陕政月刊, 1943, 5(4): 3.
- [25] 吴天植. 本馆文物展览之旨趣[J]. 学风, 1936, 6(1): 1.
- [26] 举行西康文物展览[J]. 新科学, 1940, 3(1): 111.
- [27] 左景权. 西康文物展览会之意义[N]. 中央日报(重庆), 1940-03-16(4).
- [28] 纪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会[N]. 申报, 1922-12-20(6).
- [29] 北大卅一周年纪念第二日[N]. 大公报(天津), 1929-12-18(5).
- [30] 景星. 记北大卅一周纪念之古物展览会[N]. 上海报, 1930-01-05(2).
- [31]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嘉兴分会 公开展览石器骨器陶器[N]. 大公报(上海), 1937-06-19(10).
- [32] 陈前. 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嘉兴分会成立经过[N]. 时事新报(上海), 1937-06-30(7).
- [33] 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沙古器物之展览[J]. 图书季刊, 1943, 新4(3-4): 129-130.
- [34] 埃及新掘出古物之展览[J]. 时报图画周刊, 1924, 5(11): 1.
- [35] 苏俄开考古展览会[N]. 民国日报, 1925-08-24(5).
- [36] 韩儒林. 突厥文网特勤碑译注[M]. 北平: 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 1935: 1.
- [37] 卫聚贤. 古物出国展览[J]. 说文月刊, 1944, 3(12): 1-5.
- [38] 新华. 行政院参事滕固谈古物展览意义[N]. 金刚钻, 1935-04-16(1).
- [39] 草央. 民教馆参观奄城金山古物展览[N]. 时代日报, 1936-02-17(2).
- [40] 草草. 奄城·金山古物展览参观记[N]. 草报, 1936-02-19(4).
- [41] 周口店原人头壳将在沪陈列[N]. 新闻报, 1934-11-18(14).
- [42] 山西省立图展览古陶器[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1, 6(5): 33.
- [43]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记事[J]. 图书季刊, 1943, 新4(3-4): 130-131.
- [44] 李光谟. 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李济治学生涯琐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250-252.
- [45] 谭国古物展览 五光十色多二千年前物[N]. 益世报(北京), 1930-12-31(3).
- [46] 博望侯墓道古物校内展览记[J]. 西北联合大学校刊, 1939(10): 18-20.
- [47] 邵元冲日记(中)[M]. 王仰清, 许映湖, 整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703.
- [48] 皖寿县古物公开展览[N]. 中央日报, 1934-02-20(6).
- [49] 考古成绩展览会延长一日[N]. 中央日报, 1931-02-24(9).
- [50] 中央研究院考古成绩展览会延长一日[N]. 时事新报(上海), 1931-02-25(6).
- [51] 济英. 怎样去考古[N]. 中央日报, 1935-05-22(12).
- [52] 荆敏. 我研究考古学的原因与目的——写给青年朋友们[N]. 益世报(天津版), 1936-02-03(12).
- [53] 卫聚贤. 古物展览会的意义[N]. 中央日报(重庆), 1941-02-13(4).
- [54] 胡肇椿. 考古学研究热潮中 现在考古学者应取之态度与方法[J]. 考古学杂志, 1932(1): 9-21.
- [55] 郑师许. 十年来之中国考古学[J]. 大夏, 1934, 1(5): 159-172.
- [56] 斗鸡台考古 第一期工作将告竣 发掘范围决定扩大[N]. 大公报(天津), 1934-12-19(10).
- [57] 考古影片之创摄[N]. 上海夜报, 1925-03-18(4).
- [58] 考古影片之创举[N]. 申报, 1925-03-18(7).
- [59] 徐玲. 民国时期关于文物归属权的争议——以殷墟发掘为中心的历史回眸[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07(4): 33-36.